

学林

← (上接5版)

梦白、姚茫父合写一件《游猪图》，后来辗转到台湾，1998年曾著录于(台北)历史博物馆出版的《清末民初书画艺术集》(第226页，图C59)，2009年出现在中国嘉德秋拍“传承与变革——亚洲重要藏家之晚清民国书画集珍专场”。目前藏家不明。

1935年元旦，《北平晨报·元旦增刊》再次刊发母本《游猪图》并配发黄子美亲自撰写的短文。文中明确写出了这次宴集是“一夕赛季常招宴任公、宗孟、茫父、静生、梦白诸人，予与志摩以地主亦获陪座末”。

以上是由三件《游猪图》实物及两篇亲历者早期刊发的短文所归纳出的基本史实。然而，由于绘画实物不易见，而两篇文章年代久远，刊物也不易见，以至于这些基本信息知者不多，早在上世纪40年代，《游猪图》的故事就已经在不断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信息失真与文本变异。

《游猪图》故事的文本变异

熊佛西与《游猪图》

1941年，梁任公逝世14周年，著名戏剧教育家熊佛西应周之风之约，写《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》一文以纪念，刊于1943年2月《文学创作》1卷5期。文中非常简略地提到《游猪图》故事：

又一次，在一个宴会上，某名士忽谓古今诗人从不以“猪”字入咏，先生乃诵乾隆“夕阳芳草见游猪”之句。

这是《游猪图》故事首次出现在熊佛西笔下，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，但却是故事“由头”变异之始。1947年，熊佛西发表《故画家王梦白》一文，刊于《评论报》1947年第9期，第16—17页。再次提到《游猪图》故事：

吾友王羽仪兄昔与梦白过从甚密，故羽仪所作各画亦颇得梦白神趣，三年前余在桂林时见王君，所作《夕阳芳草见游猪》一幅，极似梦白笔墨，几乎可以乱真，是画题云：

“十年前余访故画家丰城王梦白先生于旧京之受璧胡同，见其所作游猪一幅，梁任公先生题‘夕阳芳草见游猪’数字，并跋为乾隆御制句。梦白先生告余此画系某公招饮即席所写，席间因画及诗，本为古来未有以‘猪’字入吟咏者，时任公先生在座，谓乾隆御制诗曾一度及之，因诵‘芳

草游猪’之句，并跋记如此云云。梦白任公两先生既先后作古，此画遂不知流落何所矣。客中偶忆此段翰墨因缘，爰仿其意作此，离乱以来，书画久疏，未能拟其万一也。”

据余所知，题中所云“某公招饮”之“某公”，乃新诗人徐志摩也，当时新月社方成立于松树胡同，常举行雅集，此次参与盛会者除任公与梦白外，尚有胡适之、陈西滢、凌叔华、梁思成、林徽因诸先生与女士。然画家仅梦白一人，盖其喜与绘画圈子以外之人士交游。

文中说三年前也就是1944年，在桂林见到王梦白的弟子王羽仪所临写的《夕阳芳草见游猪图》一幅，“极似梦白笔墨，几乎可以乱真”，而画上长题云“梦白先生告余此画系某公招饮即席所写”，可知王羽仪先生见到的正是母本《游猪图》。至于招饮的“某公”为谁？恐怕王羽仪作画时已不复记忆，显然是其较生疏者。而熊佛西先生则写道：“据余所知，题中所云‘某公招饮’之‘某公’，乃新诗人徐志摩也，……此次参与盛会者除任公与梦白外，尚有胡适之、陈西滢、凌叔华、梁思成、林徽因诸先生与女士。”这已属于“小说家言”了。尽管他所举5人皆与新月社关系密切，然而1925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尚在美求学，怎么可能与会？如果是大名鼎鼎的徐志摩宴客，王羽仪又怎会在作画时不复记得？

熊佛西先生的“据余所知”不知所据为何？听上去很有“知情者”“当事人”的味道。但是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并非当事人，从他的“演绎”可知他亦非知情者。这是目前所知关于“游猪图”故事文本最早的大规模“变异”。当然，熊佛西只是听闻，转述，说明“游猪图”的故事在当时已经有了多种版本流传。

刘海粟与《游猪图》

著名画家刘海粟也曾以“亲历者”的口气谈论过《游猪图》的故事(按，刘海粟：《忆梁启超先生》，实际由柯文辉执笔，最早刊载于刘海粟《齐鲁谈艺录》，山东美术出版社，1985年。后收入夏晓虹编：《追忆梁启超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7年第1版，第290—333页)：

……

几天后，志摩请朋友们吃饭，除了梁先生以外，还有闻一多、王梦白、姚茫父、胡适。

胡适说：“中国古诗很多，诗人都吃肉，就是没有人写过猪。这个畜牲没有入过诗。”

“不见得，清朝乾隆就写过‘夕阳芳草见游猪’的句子。”梁先生真博学。

“猪可有人画过吗？”胡适

又提出问题。

“没有人画猪而出名，但可以画。”梦白先生接着说。

“你能画一张么？”志摩也在凑趣。

“就用乾隆的成句为题好了。”梁先生喷出一圈圈香烟，微笑着。

“好！”梦白很快就画成了。应当承认，猪是很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东西，用美的手段来表现，就要艺术家的本领。梦白所画，墨韵自然，浓处不死，层次分明，这是很难的。

梁先生题了那句诗，茫父也另题了一首，这张作品曾在《晨报》画刊上登载过。

刘海粟口中宴会的主人沿用了熊佛西的说法：徐志摩，参与者又多出了闻一多和刘本人。文章以对话体写出，给人以亲临其境的感觉。不过，在1981年刘海粟本人道出这段“逸闻”之前，未见有任何文字提到过他也是《游猪图》宴集的亲历者。让刘欣慰的是，1986年，柯文辉撰写《艺术大师刘海粟传》(山东美术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27—128页)，在刘说的基础上又作进一步演绎：

……

海粟自小曼家里回来，屋子里很热闹，胡适之、志摩、茫父、梦白围成半圆看诗人闻一多给梁任公画像。

海粟一看，一多的画线条结实(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)，形也抓得很准。宽圆的脑门，方下巴，阔嘴，含笑的眼睛，勾出任公睿智的学者风度。

“好啊~~！”海粟大声喝采，然后才招呼朋友们。

“我不是画家！你和姚、王两位先生才是科班出身呢！”一多笑得赤诚、谦逊。

“你的诗很好，诗和画是分不开的。”海粟说。

“那你也写写新诗嘛，既然分不开。”一多“将”了海粟一军。

“我只看不写。沫若、志摩也劝过我，慢说下海，票友也不会当，还是画我的画！”海粟笑了。

“海粟也来一张速写吧！”志摩出了题。

“我画得不好，你快动手！”一多也在催促。

“梁先生累了，不画了！”

“画吧，不要紧！”任公喷出一圈圈青烟，颇有兴致。

海粟画得很奔放。下巴方厚，嘴唇突出，眼角略带皱纹。志摩从饭馆叫了几个菜，除了茫父和海粟能来几杯，其余皆非高阳酒徒。

“古代诗人都吃肉，可是没有人写过猪。”胡适为猪鸣不平。

“不见得，乾隆就写过‘夕阳芳草见游猪’的句子。”任公纠正胡适的说法。

“可有人画过猪吗？”胡适

又提出疑问。

“没有人靠画猪而成名，但是可以画的。”梦白回答说。

“你能画一张么？”志摩又在凑趣。

梦白放下筷子，走到海粟下榻之处，几笔就勾成了一只猪，墨韵极好。

任公题上乾隆成句，茫父写上一首诗，此画后来载于《晨报》。原画由任公送给了好友赛季常，现存贵阳老作家蹇先艾家。

当年刘海粟居京时，曾是新月社的常客，也常在徐志摩主持的《晨报副刊》发表作品。他或是看到过《晨报副刊·星期画报》刊发的《游猪图》及文章，或是曾经听当事人如徐志摩、黄子美等讲述《游猪图》故事，故而在时隔半个多世纪的1981年，在刘向柯文辉口授《忆梁启超先生》一文时，采用他惯用的“乾坤大挪移”手法，将自己的经历与《游猪图》宴集故事拼接糅合在一起了。刘的名气之大，使其文章广为流传，又被不断转载、收录在各种选本中，以至于“流毒深远”。

而不可思议的是，韩石山在撰写《徐志摩传》时，直接沿用了刘、柯二人的演绎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徐刚在撰写《烂漫饮冰子：梁启超传》时，也采信了刘海粟的“小说家言”。于是这“小说家言”也便借着徐志摩、梁启超等严肃的传记堂而皇之地被世人接受为“史实”了。限于篇幅，笔者不在此转引两本传记中的文字了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出来对照着读一读，一定不觉莞尔。

如果说普通小报作者出于猎奇而写闻人轶事，尚可理解。但是为人立传，特别是为梁启超、徐志摩、刘海粟这样的历史人物写传记，贵在尊重史实，岂能如小报记者猎奇般不加考证？其实关于《游猪图》的第一手资料并不难检索，徐刚文中已经提到1926年5月发表于《晨报副刊·星期画刊》的《夕阳芳草见游猪》一文，却不知为何没有采信这最早报道，反而采用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由刘海粟口述、柯文辉执笔的一篇随笔。此外，徐文将《夕阳芳草见游猪》一文归在任公二弟梁启勋的名下，又不知所据为何。笔者推测，是他在参考夏晓虹编《追忆梁启超》一书时，将梁仲策(启勋)所撰《曼殊室填词》一文的两条注释混为一谈了，这两条脚注并列，第一条是对作者署名“仲策”的注释“即梁启勋”，第二条就是对“夕阳芳草见游猪”典故的注释，节录了1926年5月9日《晨报副刊·星期画刊》的《夕阳芳草见游猪》一文。

梁启超弟子吴其昌先生于1943年撰写的《梁启超传》，是非常严肃之作，十分遗憾的是——200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该书，附录居然也收入了刘海粟充满了“不真实”的《忆梁启超先生》一文。

还有一个例子，则更能说明刘海粟演绎的《游猪图》故事“流毒深远”，且更为可笑，那就是关于“胡适与梁启超谁学问更渊博”各种版本的无聊演绎。如：文林编著《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：细说民国大文人》(现代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347页)；梦江南著《人间最美纳兰词》(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第146页)；王恩山主编《散落的历史》(新星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33页)；黄团元著《文人有行：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46页)；刘超著《讲台上的民国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1页)；纪陶然著《微言大义：晚清民国留言簿》(同心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20页)；王牧编著《微历史：1840~1949百年家族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7页)；潘剑冰著《民国课堂：大先生也挺逗》(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31页)。

……

此外，尚有很多例子，不胜枚举。从字里行间可知，所有这些关于胡适与梁启超谁更渊博的津津乐道，都源自刘海粟的“向壁虚造”，而上述作者皆当做“史实”来加以引用。

结语

行文至此，不能不发感慨：一言之立，其不易若此！很难想像，如果没有上述三幅作品(或其图片)的存世，仅仅依靠文本的流传，关于1925年秋天发生在新月社的那次宴集之真相，会是多么扑朔迷离。任何事件，在口口相传或文本转述的过程中，必然会出现信息的衰减和变异，《游猪图》的故事真真是“图像即历史”的佳例！《游猪图》故事的趣味性，使得当时的亲历者大都乐于作为谈资，于是“一传十，十传百”，在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变异，“添枝加叶”，或许会更有、更生、更动，但是距离真相也就渐行渐远了。《游猪图》故事虽小，但是其流转传承中不断演绎和变异的过程，人们在引用和转述历史故事时的态度，不是值得每一位作者思考吗？其所折射出现象，不是值得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引以为戒吗？

(作者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)